

中华学人丛书



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

◎ 吴天墀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吴天墀文史存稿 (增补本)

◎ 吴天墀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吴天墀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12699-6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4624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WUTIANCHI WENSHI CUNGAO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39.75

字 数：61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王艳平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吴天墀先生川大毕业照



(前左起) 李竹耕、刘樊与 (后左起) 罗著尧、
吴天墀、张垂诚、伍柳村合影



1949年之后吴天墀先生唯一的全家合照



吴天墀先生耄耋之年登峨眉



一生最爱是读书



2004年2月, 吴天墀先生最后的户外照



和徐中舒教授在一起



说时迟, 那时快,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吴天墀先生和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喜见学子成俊才



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克恰诺夫来访

少狂喜文章，頗復好功名。稍知古人
心，始欲老蠶耕。低徊但志食，邂逅
亦專城。仰慙冥冥士，俯愧擾擾
氓。良夜未渠央，青燈數寒更。撥
書置左右，仰屋慨平生。

十月廿九夜寫王荊公詩

吳天墀先生手迹

为史学开出光焕之新景

——敬读《吴天墀文史存稿》

罗志田

有幸拜识吴天墀先生，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概是经刘复生、蔡崇榜兄先容（或亦有陈力兄的美言），得面聆雅教，有胜读十年书之感。记得前人说过：“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此说应很久远，在宋代大儒程颐的口中，已是“古人言”了。^①与高人晤谈，本是难得的机遇。是否获益，则全看缘分。有缘则能有所悟，似知似觉之中，学问已经长进，往往胜过自己读书。

余生也晚，不少大师已归道山。且老先生大多谨守不好为人师的旧训，不叩不鸣。读大学时尚不悟高人言传的紧要，往往仅向授业的老师请教，又错过了一些机会。大学毕业后，渐有所悟。曾到北大进修半年，北大的课仅听了一门，却蒙周鸿山先生引介，常到清华园向吴其玉先生请教，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获益匪浅。在美国念书时，蒙吴老先生介绍，又得以向他昔年的弟子刘子健先生请益，更领会了当面言传可以使人通达的微妙。回国之后，已知珍重类似的机会，而老先生却又少些了。然而机遇总是有的，拜识吴先生，就是我学问之路的一大缘分。

先生治学本目光四射，或也希望道术能传，故对各方面的后学皆不吝点拨，循循善诱，使人如沐春风。有段时间，常去请益；笃钝如

^① 当年或许受到佛门所谓“言下觉”的冲击，程、朱俱曾言及此。小程子至少两言之，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伊川先生语八上》，245、33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朱子更有进一步的申论，参见《朱子语类·训门人五》，王星贤点校，第 7 册，2809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我，亦觉学识皆进。而先生并不拒人于门墙之外，有时兴之所至，竟自扶杖叩门，说是“来看看你好不好”。那时我住五楼，先生已年逾八十，拾级而上，即使体力能支，亦非老人所宜。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后怕。惟自己文债日多，登门向先生请教的次数渐少。后来也曾起念要为先生做一口述史，终未付诸实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那时承蒙先生赐赠《吴天墀文史存稿》一册，捧读再三，眼界大开。家中书架上也有先生自称“业余写作”的《西夏史稿》，却是1980年初版时赐赠内子的。原来先生落难时曾长期住在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内子家也在那里，或因对先生执礼甚恭，而获此厚赠。《西夏史稿》我仅翻阅，惟对《文史存稿》，每读便有所得。

读书受益，本有很多种，有的书给人以启发，有的书叙述事情的原委，有的书示人以可用的材料，有的书则直接告诉我们：书不可以这样写。吴先生的书，属于第一种，不分专业，皆开卷有益。其言传亦然，不论何人，有缘即有所悟。而读先生书，又不能不论世知人。

一、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的通儒

在我念书的时候，吴先生便是位传奇式的人物。那时只听说先生在1949年前曾任县长，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也是抗战后第一届国大代表，后遂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那个时代，能有工作名曰“参加革命”，“反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工作，只能长期靠拉车谋生。后经老师徐中舒先生援引，进川大历史系资料室，才稍稍回归史学，然亦长期不顺。我在与先生接触稍多后，又知先生任县长之前，还曾任西康省政府秘书，为省主席刘文辉写讲稿三年多。中江李鸿裔曾挽曾国藩，说他“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若不计事功之大小，吴先生在国难（对日抗战）时之所为，庶几近之。理想型的士大夫，从来不必有专长，却也随时预备着召唤。以过去的观念看，先生亦所谓经世致用之才乎？

以前仅从先生自撰的《往事悠悠》（见本书代序）中略知其经历，最近读了先生长子杨泽泉（随母姓）世兄自印的《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以下所述先生经历，《往事悠悠》外，多本此书）一

书，始知先生的人生，远更坎坷，仿佛应了那句老话：不如意事常八九。

吴天墀先生 1912 年生于四川万县，七岁入私塾，八岁父亲就去世。入小学后，时断时续，辗转多校。甫入中学一年，母亲也因病弃世，先生竟不得不“自立”，只能在同学协助下继续学业。适逢过年，竟无家可归，还是同学何其芳邀至其家暂住。先生于年三十夜草草葬母，在寒夜中孤身步行二十余里，二更时分才找到何家。人生冷暖，集于一日，终生难忘。

后先生投靠在涪陵的母舅，得其资助，读完中学，又考入四川大学。也因此，先生常对人说是来自涪陵，以致不少人也误认先生为涪陵人。或许万县已是不堪回首的伤心地，然先生仍以“浦帆”为别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代替了本名），寄寓其怀乡之情。盖万县古为南浦郡，据先生的自述，这名字表示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不料帆从南浦起，漂泊此一生。无家之乡，终生难归，只成一位“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言似平淡，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不过，当年四川各地的教育水准不低。先生虽家境不好，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读书经历，他自己说得较少。惟从小学起就能常考第一，必以能文称；尤其旧学渊深，诗做得相当好，得蜀中士风之正传。^①如 1962 年初春曾有《闲居独学》一首：

竟日不出户，寂寞守空斋。春风岂虚到，柳眼又新开。竞食鹅儿闹，窥帘燕子来。陈编看不厌，暝色上莓台。^②

时先生落难于四川大学十四宿舍，那是一片由过去慈惠堂火柴厂

① 晚清到民国四川诗风与外略不同，当时南北都流行所谓同光体，上接宋诗，偏重用典。而四川诗风则至少衔接明末清初吴梅村（伟业）、王渔洋（世禛）一脉，学唐诗而上通汉魏，惟亦偏重典雅。大体上，清诗从一开始就有些“脱离劳动人民”，不追求“老妪能唱”，而更带书卷气（最典型的对比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但若因求典雅而失清通，便已入歧途了。

② 吴先生曾书此诗赠兰州张思温先生，引自石宗源主编：《张思温文集》，761 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 年。

旧址改建的简陋平房，须用公厕。先生所居小屋，适为其邻。地面潮湿，杂草稀疏，藓苔错落，实非宜居之地（莓台既是用典，也是写实）。而其诗不怨不怒，字面疏淡，有老杜之风，诚可谓“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① 不见其人读其诗，也可略知其襟抱。

先生在中学就熟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考大学时便以一篇《六经皆史论》获第一名，给主考老师以深刻印象。入高中适逢“九一八”事变，遂有书生报国之志，与同学一起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创办《满蒙藏周刊》，并自撰《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连载之。考入川大后又在校刊连载《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实亦中学时所作。

那时先生已参加青年党的活动，同时又学习世界语，两者都是当年的“四川特色”（四川不仅是青年党的大本营，也是世界语在中国的重镇，如卢剑波、巴金等，都曾为名扬中外的世界语健将）。从《文史通义》到世界语再到青年党，仿佛相隔甚远，却印证着一个身世坎坷的漂泊少年，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既温故知新，又放眼世界，并表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这位青年士人有传统的积累，却又是现代的，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工诗文，习世界语，参加青年党，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

吴先生1934年考入川大，读书期间的一个大变化，是国民政府因预备抗日而真正进入四川（四川在北伐时虽然易帜，仍成功抵制了中央的进入，维持着“北洋”风格的统治）。外来中央政权与明显带有“北洋”特色的地方政治，有着种种或隐或显的紧张和冲突（其实此前入川的红军，也带来很多新风尚，不过其在川内影响更多是区域性的）。而四川的青年党，在与国民党竞争的同时，也就自然接上了所谓“地方军阀”的地气，逐渐显露出一些独特的地方性认知。这类“地方性知识”，是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四川政治、四川文化和四川读书人的必备基础。

吴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史学季刊》上发表的《张詠治蜀事辑》，便是一篇学以致用力作，既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又深具上述的“地方

① 陆时雍：《诗镜·总论》，10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性知识”。针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传说法，先生以为，其实并非蜀人之好乱，而是其处境常驱之乱。盖四川“民性脆柔，易启奸蠹之虐；积忿蕴怒，不敢与校。及至生事艰困，不可复忍之时，铤而走险，遂归必然”。此大体本苏辙《蜀论》所言，而略去小苏将蜀人与秦晋之民的比较，但仍秉持其“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之意。

文章指出，历代“治蜀苟得贤者，使其民有以乐生送死，则心悦诚服，从风而化，其效亦至易睹”。故“历代蜀乱之责，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系于治蜀之得失：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治则蜀人安以乐，乱则蜀人危而苦”。思安恶危、趋乐避苦，本人之常情，蜀人自不例外。而其被“处境”驱之乱，乃因“地偏一隅，山川修阻，朝廷之政令难达，上下之情意易乖”。先生晚年修改此文，更明言宋初朝廷对四川“猜防控制，深怀戒心，有不可终日之势。惟张詠守蜀，擘画经理，能治民心，使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有所消除。情意既通，政化易行，从此川蜀局势，步入正轨”。

此所谓蜀人之“处境”，稍近西人近年爱说的 context，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山川修阻”，仅是自然的一面；“上下之情意易乖”，则更多是人为的一面；而“生事艰困”到无法维持常规生活，则是其社会的一面。三者结合起来，大致近于史家所谓“思想语境”了。任何时候，若治蜀得人，便可消除“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也就不会出现“乱先而治后”的现象。反之，则川蜀局势便很难“步入正轨”。

先是教育部于1938年撤川大校长张颐，而代之以程天放。张为蜀人，而程则被视为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囊中人物”。当时川大师生曾有较大规模的“拒程”举动，吴先生想必也有感触。此文无一语述及时政，然似乎处处皆针对当时川局而言。无怪不久之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忽聘请天墀先生作他的秘书，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此前两人并无过往，据说刘就是读到《史学季刊》上的文章而知先生之名。我的猜想，或许刘文辉深感吴先生说出了他（以及其他地位相类的四川军人）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吧。

那是1940年秋的事，此后先生担任西康省政府秘书达三年多。在

讲话不靠念稿子的时代，为大人物写讲演稿，是一种“代圣立言”的工作，要能体味其心胸思路。如先生晚年自述，既“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作些冠冕堂皇的议论”；还要言之有物，使讲者有临场发挥的余地，能“表现自己的才华”。^①对一般刚毕业的书生，这是相当困难的。而吴先生本通人，虽进入状态有些困难，毕竟素怀经世之志，对川康政治有切身的体会，又有历史文化的积累，后来显然比较得心应手。盖此乃双向的选择，不仅要起草者能写，还要讲述者能接受、能认同。若非此道中人，很难持续写出合适的“代言”。

这些讲稿都是时代的痕迹，对研究吴先生和刘文辉，以及当时的川康政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集结起来，出一本代拟刘什么公奏议集一类的书。据说刘文辉当年就有此意，大概是不希望先生多年都“白辛苦”了。我也曾向先生言及，但先生说并未留稿，一笑置之。想想也是，若曾留下，历次“运动”岂不更添罪状，恐早难生存了。惟雁过留痕，将来若要给先生写传，当去查那时西康和四川的报纸，必有所获。

刘文辉还是那种知人辛苦的长官，遂在1944年任先生为芦山县县长。至抗战结束后，先生自动辞职卸任。中国的传统，能读书也就能做官。然而官也有很多种类，一个读书人究竟是否具“百里之才”，这是直接的考验（在此基础上，还有“方面之才”的更大考验）。而芦山地处偏远，民风剽悍，产鸦片，匪盗出没，至少不是所谓“卧治”可了。张邦炜先生后来曾就此询问过吴先生，据说先生笑了笑，然后回答：“不会做，做不好。”^②

这话要细心体味。吴先生在1946年曾撰文说，离开芦山回成都教书几个月，体貌较前丰腴，“于是我才感悟到，以前数年的官吏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两方都未必相宜”。^③可知“不相宜”的觉悟还是后出，

① 见《往事悠悠》。

② 张邦炜：《川内开花川外红——缅怀吴天墀先生》，见《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0~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③ 吴天墀：《自西徂东》，载《青年生活》（上海）第5期（1946年9月1日），86页（卷页）。